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新政革命与日本

——中国，1898-1912

[美]任达 著 李仲贤 译
刘东 主编

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之战中败给“蕞尔岛国”日本后，它不得不面对现实，派遣大量留学生东渡扶桑，探求日本的富强之道；同时又聘请了大量的日本专家来华，作为晚清新政的顾问。在这种社会转型、组织创新的时期，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便将焦点聚集于此，对这种文化模仿、组织平移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策划 周文彬

新政革命与日本

——中国, 1898—1912

[美] 任 达 著 李仲贤 译

本书责任编辑委 刘 东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opyright © 199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据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年版译出

- 书 名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 1898—1912 年
编 著 者 [美] 任达
译 者 雷 颐
责任编辑 汪振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页 2
印 数 1—6130 册
字 数 226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975—2/G·575
定 价 1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

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中文版序

这中文版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不仅是英文原著的译文,而且也对原著作了修订,或可称之为“修订中译版”。

1993—1995年间,我曾三次访问中国,累计历时一年多,期间收集了不少资料,包括我写作时未能直接引用的原始资料,这就可以在这“修订中文版”中引用。这些资料对在中国的学者来说,应是案头常备的。

译者李仲贤先生非常细致,为了翻译准确,乐于让我阅读他的译稿,加以增删校改,包括对英文原著的修订,这就是我认为本书可称为“修订中译版”的原因,而这也完善了原著。

李先生是退休人士,按退休前的职业,如果称他为学者或翻译工作者,他会感到不自在的。但他像学者般热爱历史和学问,也像专业教师或翻译工作者般热爱语言文字。这是我在1996年9月和他在广州第一次会面时,在近来我们的通信中得到确证的。

每当我想到李仲贤时,我觉得他在精神上是一个学者和翻译工作者。由他翻译我的书,我是感到非常幸运的。

前言

如果没有众多的机构和个人及时而慷慨的支持,本书的一些概念不可能得以发挥,这本书也不可能写成。1986年,我获得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①的暑期津贴,又得到亚洲研究会东北亚委员会^②的资助,得以进入史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③进行研究,构思了1898至1907年近代中日关系中“黄金十年”的概念。感谢雷蒙·迈耶斯^④,伊米高·穆菲特^⑤,和马克·道格拉斯^⑥,以及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⑦同人的帮助,使那年夏天我在胡佛的研究,各方面都非常完满。

1986—1987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及美国学术学会的日本研究联合委员会^⑧的学术研究津贴,使我得到日本全力研究。出于东京大学退休教授、现任亚洲大学校长卫藤沈吉的好意,安排我在东京大学。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院的石井明教授为我打点一切,使我在不是一年而是两年里都感到宾至如归。认识东京国立教育研究所^⑨的阿部洋教授,使我喜出望外,我们在许多研究问题上都有相同的兴趣。

我在日本的第二年,1987—1988年,得到纽约亨利·鲁斯基金会^⑩赞助的“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研究计划

(1985—1991年)”的研究津贴,我的研究题目是《日本佛教在中国传播中的冲突与对抗,1873—1945年:与基督教相比较》,这一研究深化了我对“黄金十年”的理解,因为在1904至1908年间,中国对日本佛教布道团的抗拒达到高峰,成为普遍性的和外交的问题。

我在亚特兰大任教的乔治亚州立大学,对我施惠良多,不但资助我在1987—1988年第二次出国研究,而且还在今后合约订定每年有三个月假期,使我每年有整整六个月时间能和妻儿共聚,妻子从1987年起便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官。这一切的安排,历史系主任格雷·M·芬克教授^⑩都起了重要作用。我借此机会表示衷心感谢。

我长期受惠于已故费正清教授,和卫藤沈吉教授,安特鲁·里敦教授^⑪,史蒂芬·列文教授^⑫,多年来,他们不断写信支持我的研究,包括对本书各项问题的研究,并提出建议,我万分感谢他们不断的支持。

在我第一次到日本研究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妻子泰凯乐和我的孩子莎拉和安梅对我的帮助,不仅是他们觉得“在日本过得愉快”,而且每天和我一道分享成就。莎拉和安梅在日本公立学校学习了三年,和同学们结成很好的友谊,也许她们能借此了解更多的日本生活。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出版委员会的弗罗伦斯·特里弗顿^⑬经常对我指点,她的同事凯瑟琳·肯南^⑭对编辑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乔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学生卡露·施拉克尔^⑮校对了初稿,并对定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谨以此书奉献给我的双亲、文化人类学者任乐德博士和任瑞德博士^⑯,在我两岁时,他们作为教会的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和菲律宾工作,带我第一次到了亚洲。抱憾的是,慈母在1988年6月12日庆祝金婚纪念后仅仅六周便辞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注 释

- ①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 ② Northeast Asia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 ③ Hoover Institution for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 ④ Ramon Myers
- ⑤ Emiko Moffitt
- ⑥ Maxine Douglas
- ⑦ Hoover Institutions' East Asian Collection
- ⑧ The Joint Committee on Japanese Stud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d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 ⑨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okyo
- ⑩ Henry Luce Foundation, Inc., of New York
- ⑪ Gary M. Fink
- ⑫ Andrew Nathan
- ⑬ Steven Levine
- ⑭ Florence Trefethen
- ⑮ Katherine Keenum
- ⑯ Carol Schlenker
- ⑰ Drs Hubert and Harriet Reynolds

序言 概念的形成

“黄金十年”虽未用作书名，本书却是围绕着这概念而展开的。在中日关系史上，1898—1907年间，确曾普遍存在着出人意外地融洽而有建设性的十年。“黄金十年”的概念，最先形成于1986年，在当时，这是全新的甚而似乎是荒谬的概念。谁都知道1945年前的现代中日关系，就是日本不断地侵略中国，很难或绝不可能为之翻案。

这概念没有受什么特别资料或事件所启发，而是我在钻研1870—1945这75年的中日关系时，从过去10多年的考证积累中形成的。从1978年开始，我研究1898—1946年的东亚同文会和它在上海的学校——东亚同文书院（1900—1945，1939年改为大学）^①。事后我认识到，这些机构和它们承担的责任，以及它们牵连着的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和构建“黄金十年”的概念，也有助于锻造我自己对这一阶段中日关系的观点。

在这10多年研究中，有助于我观念形成的，还有美国从事中日研究的前辈、马里乌斯·詹森的著作^②，和中日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已故的实藤惠秀，他的著作都依据丰富的材料写成^③，对我影响极大。此外还有中国学者黄福庆和林明德^④。以下学者的著作，对我

了解晚清时期发展有极大帮助^⑤，包括 H. S. 伯鲁纳特(Brunnert)，V. V. 哈格尔斯特朗(Hagelstrom)，梅里贝斯·卡梅伦(Meribeth Cameron)，拉尔夫·鲍威尔(Ralph L. Powell)，马里乌斯·J·梅佐(Marinus J. Meijer)和玛莉·克纳宝格·莱特(Mary Clabaugh Wright)等，其中对日本持独特见解的唯有拉夫尔·鲍威尔。最深入广泛研究日本对晚清特别影响的，莫过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东亚：现代的变革》^⑥。在我写这本书时，总是反复查阅这本费正清的著作，回想较早时对我的影响。

在研究初期，我强烈地回忆起王风冈 1933 年写的《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1895—1911》，它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更多更深地了解在 1895—1911 年间日本对中国的特殊影响。这是 1986 年春的事。

这年夏天我遇到良机，获得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的暑期津贴，在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及在史坦福大学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研究。半个世纪前，王风冈也是在史坦福大学进行研究的。依着王的注释条目，我加以资料补充，这些资料说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远不只在教育方面。

到两个月的研究结束时，我已毫无疑问，认定那些年间中日之间关系是密切的、具有独特成果的，尤其是对中国方面而言。破坏这种特别关系的是日本帝国主义。1905 年日本战胜俄国后，骤然摆明姿态，集中对中国侵略。到了 1915 年日本提出 21 条要求时，关系已经糟到如此程度，一切美好的回忆都在迅速地消失，任何善意都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且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要深入进行研究，就要细查 1911 年前中国的、日本的和西方的纪录。

幸运的是，史坦福只是我到日本进行一年研究旅途的第一站，第二站是夏威夷的檀香山，美国历史学会太平洋沿岸分会第 79 届年会(8 月 13—17 日)在那里举行。我在会上第一次发表了我在夏天形成的概念，当时使用的词语是“十年蜜月”，论文的题目是

《粉碎了的崇高愿望：东亚同文会与中国，1898—1945》，论文提交“日本面对亚洲”专题小组，该组组织者及主席是俄立冈大学教授拉尔夫·福尔康纳利(Ralph Falconeri)，参加该组的有东京大学卫藤沈吉教授和平野健一郎教授，他们两位帮助我开始了十年前的中日研究。

平野教授评审我的论文，他是研究1906—1931年日本在满洲活动的一流权威，谨慎而深思熟虑的批评家，他温和却严格地批评“十年蜜月”的概念。他告诫说，动机必须按行为而评断，当时日本的行为差不多完全出于关心日本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罕有的“恶毒意图”。他指出“十年蜜月”用词不当，因为它暗示存在着“中日之间真正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而充其量也只存在相互自我获益或彼此共同利用的关系”。

这些批评不但没有使我丧失信心，反而加强我的决心，更系统地探索我的观点，了解问题的核心。年会结束后平野教授对我说，他批评的目的之一是要激励我前进。所以，当我对他的坦率意见表示感谢时，我完全是真诚的。

1976—1980年间，我曾在东京研究及教书，旧地重游，又重逢我的朋友和同事。其中一位特别的朋友是薛龙博士(Dr. Ronold Suleski)新任HARPER AND ROW亚洲出版社的主编，当时又任赫赫有名的日本亚洲学会会长，他邀请我把看法写出来，在该社的论文系列月刊上发表。他还提出“黄金十年”一词，帮我拟定文章题目：《被遗忘的黄金十年：日中关系，1898—1907》。文章于1986年12月8日发表，增订稿以同样题目刊登在《日本亚洲会社学报》^⑦。

该文于1987年末发表后，一些进展促使我增编成这本书。首先是日本、中国和西方的各种评论，当他们看到这些从未集中整理的资料时，都极感兴趣，表示好评。对我的鼓励来自日本的学者们，他们不满那些井蛙之见，这些见解或则藉以引申为保守政治，

或则把受嫌疑的看法排斥在学术主流之外(例如像我的研究那样,自1949年以来,日本盛行就中国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现代化等问题向学术观点提出挑战,这些问题在中国已受狭隘的解释及框架所支配);来自《东亚》月刊^⑧约稿写日文的文章;来自“辛亥革命研究会”邀请在1988年9月的例会^⑨上发表三小时的演说并参加讨论;还有来自平野教授出面邀请,于1988年11月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表演说。日本一些令人振奋的、富于开拓性的研究,对我帮助极大,丰富了我的研究内容,特别是阿部洋教授及其助手们在国立教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⑩。

还有来自中国方面的鼓励,中国学者们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研究生们,对我的研究公开表示兴趣(和怀疑态度),使我印象十分深刻。这研究会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每月的例会,我都参加了的。在1988年3月到6月为期12周的研究旅行中,行程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中国学者们都对我倍加鼓励^⑪。在这次旅行期间及1988年10月25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时^⑫,我得以了解中国最新的观点,获得了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就中日关系发表的大部分文章。

总而言之,即便从日本及中国学者的观点看,1988年的气候似乎适于继续探索“黄金十年”的概念。1972年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进入了恢复友好关系、热切地重新检讨过去关系、追求新的友谊和合作的时期^⑬。令人印象深刻又富于学术风范的研究进展,大大地丰富了我研究的每一方面,看看注释就完全明白了。只不过这些学术成就,一般都只狭隘地拘泥于常规的解释,对我的“新政革命”观念构架帮助不大,这一构架是在我研究后期才出现的。

去了日本两年后,1989年初,我又回到乔治亚州立大学,很高兴受到历史荣誉学会“Phi Alpha Theta”(费·阿尔法·施塔)的邀请,宣讲我的研究论文。这迫使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对那些并非

研究中国的专家,即如我的同事和学生们来说,在我的研究中,哪方面最具历史价值和相对地具有意义呢?我长期讲授世界文明史,也为它自1500年以来的进程着迷,各种类型的、暴力和非暴力的现代革命都无不具有它的特征。沿着这思路,很容易便找到答案:革命。我和我的朋友高谔博士(Dr. Edward Krebs)商量,把现代革命的概念运用到中国晚清时期。他是近代世界史教师,研究中国20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的专家,一下子就理解我的意思。当我问及题目时,他沉思片刻,随即满脸生辉,微笑着回答说:“《是谁进行了革命》,怎么样?”题目也就这样定了:《中国,1898—1912:是谁进行了革命?》^①。

研究成果概见于《中国思想和体制的革命:内容和意义》,这是为1990年4月5—8日在芝加哥召开的亚洲研究学会第42届年会《伟大的年代:中国,1901—1910》专题小组而写的^②。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围绕着1901—1910年晚清新政或“新体制改革”问题,就突然作为革命时期出现了。我后来的工作重心是研究那时的改革和日本从中所起的辅助作用,并构建新政革命的概念,这革命包含了思想和体制两方面内容,是悄悄地进行的。

1990年8月10—12日在香港召开的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上,我提交了论文《中国新政革命与日本(1901—1910)现代中国之学术与制度基础》^③,那些发展了的概念已综合在这论文中。本书充分表述了论文中的概念,其内容将在《导言》中讨论。

注 释

- ① 该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任达著《战前的中国地区研究:日本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1900—1945年》(Douglas R. Reynolds, “Chinese Area Studies in Prewar China: Japan’s Tōa Dobun Shoin in Shanghai, 1900-194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5:945-970 (1986));及任达著《训练年轻的中国通: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先驱者,1886—1945年》(Douglas R. Reynolds,

“Training Young China Hands: Toa Dobun Shoin and Its Precursors, 1886-1945”, in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1989) pp. 210-271)。

- ② 马里乌斯·詹森的经典性著作是《日本人与孙中山》(Marius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Cambridge, Mass., 1954)), 书中收集了日本人与孙中山合作的大量事例, 和日本人诡诈的鲜明例子。詹森渊博的著作是《日本和中国: 从战争到和平, 1894—1972 年》; 新著是《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1975); and *Jap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XI: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1980) pp. 339—374)。这些著作都关乎某段时期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 但未涉及“黄金十年”。
- ③ 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及《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增补》。后者已由谭汝谦及林启彦精心译成中文, 并更正了若干错误, 添补了学术注释。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 1982 年)。
- ④ 见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台北, 1975 年); 黄福庆著《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 1982 年); 林明德著《清末民初日本政制对中国的影响》, 载谭汝谦编《中日文化交流, Ⅲ: 经济及思想方面》(香港, 1985 年)第 187—213 页。
- ⑤ 见伯鲁纳特及哈格尔史特朗著《中国目前的政治组织》; 梅里贝斯·卡梅伦著《中国的改革运动, 1898—1912 年》; 拉尔夫·鲍威尔著《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马里乌斯·祖翰·梅佐著《中国对现代刑法的引进》; 及玛莉·克拉宝格·莱特编《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1900—1913 年》第 1—163 页 (H. S. Brunnert and V. V. Hagelstrom,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1912; Taipei, 1971); Meribeth 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Stanford, 1931); Ralph L. 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1955); Marinus Johan Meijer,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n China* (Batavia, 1950); and Mary Clabaugh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1968))。

- ⑥ 参阅费正清等合著《东亚：现代的变革》中，《晚清改革运动》一章（“The Late Ch'ing Reform Movement” in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65), pp. 613-633）。尤须注意费正清的论述：“从 1898 至 1914 年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人们看到日本巨大的影响……日本在这短暂期间的的影响，较之 19 世纪时英国的、或 1915 至 1949 年美国的影响，甚至人们可以认为较之 1949 年后苏联的影响都更为直接，更为深刻，更为久远。”（第 631—632 页）本研究正是为这博大的论断提供论据。
- ⑦ 任达著《日中关系史中被忘却的黄金十年：1898—1907 年》（Douglas R. Reynolds, “A Golden Decade Forgotten: Japan-China Relations, 1898-1907”,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fourth series, 2:93—153 (1987)）。
- ⑧ 任达著《近代日中关系史中被忘却的黄金十年》（Dagurasu Reinoruzu, “Kindai Nit-Chū kankei shi no naka no wasurerareta ōgon on jūnen”, *Tō-A* 250:9-11 (April 1988)）。
- ⑨ 题为《日中关系史中被忘却的黄金十年：1898—1907 年》（“Nit-Chū kankei shi no wasurerareta ōgon no jūnen, 1898—1907”）。
- ⑩ 对我帮助极大的，是阿部教授指导下精心研究的两本著作：《日中教育文化交流与冲突：战前日本在华的教育事业》（东京，1983 年），和《受雇的日本教习之研究：亚洲教育近代化和日本人》。阿部洋新编的《明治后期教育杂志刊载有关中国、韩国教育文化关系文章索引》，是目录学的里程碑。
- ⑪ 1988 年 3 月 17 日，作者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及发言要点，见作者著《日中关系的新观点，1870-1945 年》（“New Perspectives on Japan-China Relations, 1870-1945”），刊登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88 年 3 月号。在香港，我的东道主是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教授。1988 年 3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厦门、泉州、福州、杭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长春和沈阳，会晤了近代中日关系的学者，参观了大学。有关此行情况，见作者著《中国之旅随笔》（“Chūgoku kikō zuisō”, *Shin'gai Kakumei kenkyū* 9:93 and 20 (1988)）。
- ⑫ 由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赞助，该会于 1984 年在北京成立。

- ⑬ 自 1980 年以来,中国全国性及地区性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尤以东北及华北为最,足以充分说明这种变化。而对问题作平和的、批判的分析,采取探讨性的方法,则是这些研究会应有的导向。见刘天春著《关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作者对该文的英译本,载 *Sino-Japanese Studies*《中日研究》1990 年 5 月号。
- ⑭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观点的(这些观点对日本有很大影响),是史远芹、曹贵民、李玲玉的《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北京,1990 年)。这本细意精心的著作认为,1901—1910 年的新政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内的架构,是一个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的专制政府挣扎求存,是出现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参与全国及地方事务的声音。我是把新政改革放在这样的架构内:一个由帝国体制和思想控制了 2100 年的中国,主要受到外来思想和体制的影响,发生了突然而持久的转变。这就明显地提出问题:人们如何评价这不同的取向?这两个架构是无需论战的。但它们以提出不同的问题开始,查察不同的资料,并导致对近代中国不同的见解。
- ⑮ 该组由 Ernest P. Young 主持,提交论文的有谭汝谦, Roger R. Thompson 和我。Mary Backus Rankin 和 Ernest Young 一道参与讨论。
- ⑯ 该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及日本研究计划,南伊利诺斯大学国际服务计划,及中国纪念中日战争殉难者联合会(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Japan Study Progra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nd Servic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and the Chinese Alliance for Commemoration of Sino-Japanese War Victims)共同组织。